

# 跨文化传播学的知识论基础与德性转向

张楠 姜飞

**摘要:** 跨文化传播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中深入研究文化与传播交互规律的知识领域,当下被赋予了思考全人类共同价值、重构全人类交往理性的知识使命与期待。然而,当前的跨文化传播学知识体系建基于现代跨文化交往经验与科学主义现代知识论,在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层面呈现出对文化知识的本质性、计算性和普遍性追求,其学术视野和知识关怀与朝向探索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知识目标具有一定距离。随着人类文明发展与文化交往进入价值与秩序的重组期,20世纪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思潮推动知识学研究出现社会性、人格性的建构主义特征,跨文化传播学也借由建构主义路径出现人本性的德性知识论转向。德性知识论为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跨文化传播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新的思想起点。中西德性知识观之间的对话为跨文化传播学走出现代知识论危机提供了可能理路,同时也为推动建构文明互鉴视域下均衡化跨文化传播学理论生态提供知识平台和商榷空间。

**关键词:** 跨文化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知识论;德性;德性知识论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6-0167-10

人类的知性智慧为人类文明的演进提供生生不息的源动力,生命的能动理性推动人类在感知与认知世界中将经验逐渐有序化,形成人类社会不同时期的知识生态与风貌。从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来看,西方哲学关于“知识”的界定与论争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知识与真理相符”阶段、启蒙时期笛卡尔所确立的现代知识论阶段以及当代“非基础论同非内在论的结合”<sup>[1]</sup>阶段<sup>①</sup>。其中,启蒙时期基于科学与科学实验方法的现代知识论奠定了人类自17世纪以来的整体知识生态。现代知识论认为“知识是一种意识活动的清晰化和有序化”<sup>[2]2-3</sup>,其对知识的界定将人文与社会世界知识生产引向“经验性”“实证性”范式,从而奠定了近代以来国际社会科学领域知识生产的本体视域、方法路径与价值取向。

在此视域下进一步聚焦17世纪以来社会科学中关注人类普遍交往的知识领域——跨文化传播学,其知识发轫的经验来源于人类启蒙时代的大规模跨文化交往,其知识生产同样受到现代知识论涵化下的社会科学范式影响。以天文学、物理学、化学为代表的科学植入了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原初感知,从根本上提升了人类跨文化交往的经验范围与视域空间,同时,基于科学观察与实验的知识论也为人类跨文化交往经验的知识化发轫提供了基本方法。科学与科学知识论奠定了基于人类启蒙时代大规模跨文化交往经验的跨文化传播学知识论基础。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中期,基于科学的现代知识论进一步“驯化”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跨文化传播学在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心理学、传播学等社会科学的视域交叠下逐渐形成其学科体系与确证

**收稿日期:** 2024-12-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核心术语国际影响力研究”(21&ZD15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国别差异性研究”(2022JJ018)。

**作者简介:** 张楠,女,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舆论与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089)。姜飞,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2401)。

思路。法国学者孔德提出,在社会学领域应采用“实证主义”(positivism)即采用客观经验论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实证主义对现代人类学奠基者马凌诺夫斯基的功能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将人类跨文化交往研究引向客观观察和田野实验主导的经验性民族志方法论,建构了跨文化传播学领域通过语言、习惯、物质对象、思维和信仰来认识与理解“文化他者”的基本视角和方法。在人类学和民族学导向下,早期跨文化传播学形成了以“文化他者”为研究对象、以客观经验主义为主要研究范式的研究偏好。

20世纪下半叶,量子力学推动当代知识论进入多元化的非经验论、非基础论与非内在论阶段,科学“范式”概念的提出让学科共同体内部开始反思既存共识之外的多样性知识可能,跨文化传播学在传播技术与文化意识形态的格局中呈现出某种知识论的危机与省思气质。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重置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新兴信息通信技术深度变革全球传播生态,世界范围内人类的普遍交往经验范围随之发生巨变,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信息流动浪潮中萌发对外交往的问题意识,并开始着力探索自身视域下的对外交往合理性,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与体系建设由此走向开放化与“跨文化”化。例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战后发展传播实践中,从人类学、语言学和传播学的交叉视角确立了跨文化传播学的基本知识领域;20世纪60年代,日本在战后日本人论的民族认同重建中,基于社会学和语言学视角建立了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态;20世纪80年代,法国为探索如何在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文化话语秩序中提振法国文明,提出了区别于美国的跨文化传播学学理概念(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由此可见,跨文化传播学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走向一种世界性的知识景观。但不可避免的是,其现代性知识论所奠基的本体论、方法论与价值论也在接受多方检视中,因其理论的世界性解释力不足而陷入某种非自限式知识危机。

进入21世纪,数智技术革命再次冲击人类生存结构与文明交往底层逻辑,知识信息化与信息知识化对人类知识生产提供新的想象力。在从乌卡时代向巴尼时代转变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冲突进一步加深,全球文明与文化传播的版图进入价值与秩序的重组期。跨文化传播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中深入研究文化与传播交互规律的知识领域,被赋予了新文明形态下思考全人类共同价值与重构人类交往

理性的知识使命。在文明形态演进、知识生产范式迭代与文化交往理性重塑的当下,奠基于人类现代交往经验与现代知识论的跨文化传播学知识体系与朝向探索人类共同价值的知识目标具有一定距离。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以“三大倡议”为基本面向,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知识体系建设朝向全球性、世界性、文明性、发展性、安全性维度升级的知识探索全面启动。当前,中国跨文化传播学亟须从“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阶段,走向“文明互鉴”方法论视域下的“自主创造”阶段<sup>②</sup>,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基本知识方案。基于此,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知识体系建设需将其知识生产与人类知识论的历史嬗变接驳,通过分析当前国际跨文化传播学的知识论基础,以及其知识显化、知识驯化、知识异化<sup>③</sup>的过程,厘清现代知识论与跨文化交往经验的相互涵化逻辑,明确其知识的有限性与可拓展空间,为朝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跨文化传播学知识体系提供思想起点与对话空间。

## 一、知识的显化

知识(knowledge),“不仅是对外来经验的感知(perceive),更是对这些外来经验的分类与有序化(distinguish),而这种分类和有序化却奠基于内在于人心智中的某种先验结构和先验范畴的辨识(recognize)”<sup>[2]</sup>。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一个知识领域形成于20世纪中叶,“服务于二战以后美国全球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sup>[3]</sup>,但其知识促发的意识活动来源于人类近代地理大发现以来的殖民、战争、贸易等跨文化交往经验,朝向将这些经验分类和有序化的分析过程构成了跨文化传播学知识显化的原初景观。在此过程中,经验向知识的有序性转化与超越性生成受到彼时知识论的影响,在“何为知识”“何以知识”“知识为何”三个层面上形成了跨文化传播学知识领域发轫之时的本体视域、方法路径与价值特征。

### 1. 何为知识

17世纪启蒙时代以来,探索经验世界的科学主义现代知识论与人类大规模跨文化交往经验几乎同时发轫,现代知识论对知识本质的界定涵化了跨文

化传播学基本的问题视域、研究对象和知识特征。现代知识论认为,知识是经验与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所谓经验,是指人的感官在与客观事物接触过程中获得的关于客观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的直观经验。所谓理性,是人自在的先验理性。现代知识论所界定的知识生产是在理性与经验的两相向发力中形成的,也即笛卡尔所主张的“人类心灵能够产生‘观念’(ideas),而当观念符合外在事物,就形成知识”<sup>[4]</sup>和康德所言的“知性无直观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sup>[5]</sup>。因此,现代知识论所界定的知识本体是一种由理性统摄的有序经验,其知识生产来源于客观经验与主观先验的交互建构,其知识生产的标准是知识与普遍必然性真理的符合。

现代知识论对知识本质及其生成逻辑的界定奠定了跨文化传播学知识本体的经验性与先验性。首先,现代知识论认为,知识需要客观经验作为认知基础。跨文化传播学知识领域最初的问题意识萌芽于大航海时代如何认识与理解“文化他者”。在这一问题导向下,“文化他者”成为其知识生产的经验对象,在与“文化他者”交互中生发的“陌生经验”成为知识生产的直接来源。其次,现代知识论认为,知识来源于先验理性,包括理性范畴、概念结构等方面。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是对“陌生经验”的理性化解析与转化。总体而言,现代知识论涵化下跨文化传播学的知识本体是陌生经验的抽象与直观,其知识生产来源于对“文化他者”的持续性、稳定性观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文化差异的类型化解析与超越化归纳,是关于文化分析的普遍性、恒一性、确定性知识。

## 2.何以知识

现代知识论对知识本体的经验性、先验性界定决定了知识生产与习得的方法同样遵循某种科学主义的确证思路,这种方法论形塑着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的基本路径。现代知识论的知识生产方法受柏拉图知识观——知识是被确证的真信念——影响,其知识生产方法包括对客观事物的确切观察与对知识理由和证据的探寻。康德认为,知识建构于直观经验之上,一切直观范畴和知性范畴“都只能作经验的应用而不能作纯粹的应用,范畴作为知识的形式,只能在整理知识的经验内容中才能现实地呈现和运作”,“这种范畴的纯粹形式必须通过时间而转换成能运用于杂多的调节性‘图示’(schema),才能与经验发生直接联系”<sup>[2]242</sup>。因此,现代知识论知识生产的基本逻辑是在经验世界中探索确定性

真理存在,这一基本逻辑决定了知识生产的方法是以理性范畴来直观经验世界,并通过不断地收集、分析、验证等确证方法来确立经验事实与范畴概念的符合性关联。

现代知识论的知识生产逻辑涵化了包括跨文化传播学在内的一般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路。首先是经验的直观化。现代知识论认为,知识建基于经验直观,所谓直观是可以通过感官直接获得的自明性经验过程。因而,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先是对“文化他者”的经验性还原,是将“文化”直观为可观察的事实,是将跨文化传播中的“陌生经验”进行“事件”式分割,降解为不可通分的单位性行为—心理事件。其次是经验的范畴化。现代知识论认为,知识生产是经验的抽象化过程,是与认知主体的先验理性产生确证关联的过程。跨文化传播学对于“文化他者”的抽象认知建基于对陌生经验的反复观察与收集,并通过分析、判断、验证、逻辑、推理等过程对既有经验进行合并、归纳、综合,从而得出类型化与范畴化文化及其差异。基于此,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的基本方法是将人与社会的文化直观化为可被经验的符号性活动(包括语言、非语言、仪式等)、物质性载体(包括体质、器物等)和制度性行为(包括社会体制、风俗、习惯、宗法等)等,并最终通过对其长期往复的观察与分析综合形成文化范畴知识的方法思路。

## 3.知识何为

现代知识论的确定性知识本质与确证性知识生产方式,彰显出现代知识论的知识价值取向在于探索普遍必然规律,这种知识观的价值导向同样也成为跨文化传播学的知识标准。知识的价值影响知识生产行动的目的性和自觉性,现代知识论的知识生产标准受柏拉图知识观“求真”价值取向的影响,其在很大程度上认为,知识是摒除了意见之外的真理。因而,现代知识论视域下知识生产的目的是探索普遍存在的恒一真理,是对超越于现象的本质探索。

现代知识论所饱含的以“求真”为目的的知识观,也为跨文化传播知识生产奠定了基本的规范与价值旨归。首先是知识的确定性。现代知识论认为,知识“必须指向一特定的客观事实,对于知识的判断,评判认识主体是否知道的一个标准,就在于相应的客观事实是否与我们已经拥有的信念相符合,没有客观事实为依据的信念不可能是知识”<sup>[6]3</sup>。因而,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建基于对确实事实基础的确证过程,其知识生产是对文化本质的探求,是

对文化表现的现象性超越。其次是知识的普遍性。现代知识论认为,知识的适用范围是无限的,对于同类的每一个个体都必然是有效的、适用的。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所追求的关于文化与文化差异的知识,是超越于主体、时间、空间与语境的普遍性知识,是对跨文化传播中文化差异致效逻辑的规律性探索。故此,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是朝向对文化及“文化他者”的普遍性知识生产,是对于文化的本质、规律和类型等理性范畴的命题式建构。

## 二、知识的驯化

现代知识论作为一种“知识的理”或“知识的知识”,奠定并涵化了跨文化传播学从泛化的知识领域到具象的理论体系的规范化过程。18世纪至19世纪,随着“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的概念在欧美知识界扎根,基于现代知识论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走向学科化与专业化。“科学(science)的原初含义是‘学科’、‘划分’,其词根为‘skei’,源自希腊语 skhizein,意为‘分离,区分’。”<sup>[2]3</sup>社会科学即对人类总体知识生产进行了学科化区分与专业化建制,“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sup>[7]</sup>。朝向人类跨文化交往的知识生产,在社会科学的学科化与专业化“驯化”下,于20世纪上半叶开始在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心理学、传播学等社会科学的交叠下逐渐形成了跨文化传播学科的知识边界与知识结构,并在学科内部根据不同的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sup>④</sup>完成了学理化建构过程。

### 1. 实证主义进路

现代知识论认为,知识是经验与先验的综合,知觉经验只有在纯粹理性的统摄下才能形成知性理论。在这一视域下,跨文化传播学沿承19世纪以来孔德所确立的实证主义进路,从对陌生经验的实体化、偶性化、因果化理性驯化中建构了跨文化传播学的初始理论进路。

一是经验的实体化。现代知识论视域下跨文化传播学在发轫之初就形成了知识生产源于经验直观的内在思路,跨文化传播学的学理化过程受到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经验”视域影响,将对群族性符号、物质、制度的经验直观拓展到人际、群体跨文化交际中的个体行为、心理经验。跨文化传播理论开始将对文化的观察和知识生产实体化为对人的行为、心理的量性测量,形成了跨文化传播心理

学(cross-cultural psychology)研究的理论生态。例如,约翰·贝利的跨文化心理发展理论、汀·图梅的跨文化适应理论、威廉·古迪孔思特与西田司的“不确定性消除”理论、吉尔特·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组织理论等。

二是经验的偶性化。偶性的意思是属性与本质,现代知识论涵化了跨文化传播学的学术初衷,即以探索“文化他者”的确然性知识为目的,因而其理论体系亦呈现出从某种有序性建制或结构中归纳总结出关于文化规律与本质的气质,以试图提供陌生文化观察的根本方法,形成了跨文化传播学中最基础的“文化模型”“文化模式”等理论生态。例如,文化的“冰山”模型、文化的“洋葱”模型、吉尔特·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模型等。

三是经验的因果化。现代知识论的“确证”思维奠定了跨文化传播学采取科学主义的量性研究方法,即通过对经验的量性测量与相关性计算得出关于文化的自变量或因变量,形成了跨文化传播学中关注“文化如何影响人的思维方式”“文化如何影响人的表达”等理论成果。例如,“面子理论”(“面子”如何影响人的传播)、“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理论(身份如何影响个体与群体的传播)等。

由此可见,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经由经验的实体化、偶性化、因果化过程逐渐形成了其学理化的实证主义进路。在此过程中也奠定了跨文化传播学理论体系的根本学术规范,即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以描述、解析和预测人类传播行为为学术目标,以采集、统计、计算文化变量与传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为研究范式,以追求对人(群、族)的文化模式、文化结构的必然性、同一性知识为旨趣。

### 2. 相对主义进路

20世纪上半叶,现代知识论受爱因斯坦相对论冲击,笛卡尔、康德所确立的基础主义知识合法性面临挑战,后康德主义者提出同一经验对象可从不同理论视角进行建构。系统论所建构的整体性、协同性、关系性方法论对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视域下,跨文化传播学知识领域受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相对主义理论范式的影响,从对经验的相对化、协同化、交互化驯化中开启了跨文化传播学学理化的又一进路。

一是经验的相对化。现代知识论与人类殖民活动中的跨文化交往相互涵化,形成了人类学与民族学早期进化论思维。20世纪初期,人类学在弗朗茨·博厄斯的推动下走向文化相对论阶段,认为文

化经验并不是按照同一标准划分的某种物化产物或心理序列,文化只有在自身环境中才能被理解。受此影响,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开始从主客单向观察法转向“在整体中理解局部”的比较法,建构了跨文化传播学知识体系中占比最多的跨文化比较理论。也就是说,经验不仅可以通过观察实体化的行为、心理转化为知识,还可以在同系统内通过经验与经验的相对化比较生成知识。例如,爱德华·霍尔的“高语境与低语境”理论就是将文化还原于跨文化交际语境,在比较交际中的语境浓度对表意效果的影响中得出的关于文化差异的知识。

二是经验的协同化。现代知识论包含的经验外在化思路引导跨文化传播学将对经验的客观化追求作为知识旨趣,即便是对内在于人的心理洞察,也通过外显的精神刺激或行为态度变化来将其转化为可经验的对象。在系统论视域下,经验作为一种被影响、被关联的协同化介质内置于人的感知系统,文化的经验可以通过人在辨识世界中的“折射”程度来生产关于这个人的文化知识,在此过程中,文化经验不再是具有“实体”的经验,而是成为人经验世界的协同介质(类似“有色眼镜”)来被经验。例如,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所揭示的人的文化差异来自其使用的语言所建构的差异化认知域。

三是经验的交互化。文化相对主义含有对文化间平等化、均衡化的价值取向,跨文化传播学学理化在学术伦理上突破“殖民”视角,将还原“文化他者”的交杂式文化经验作为知识生产的经验来源,形成了跨文化传播学理论体系中的文化身份、文化认同等理论。

由此可以看出,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经由经验的相对化、协同化、交互化理性过程逐渐形成了其走向学理化的相对主义进路;同时,也建构了跨文化传播学科的主要学术规范,即将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引向以理解、阐释、建构文化与传播交互逻辑为学术目标,以观察、判断、评估文化与传播的同构性关联为研究范式,以追求文化多样性理解的客位知识为知识旨趣。

### 三、知识的异化

20世纪中叶,量子力学冲击奠基于启蒙科学的现代知识论,人类两次世界大战促发知识界反思科学及其知识论的危机,深受现代知识论影响的跨文

化传播学理论的可信性和有效性亦呈现出某种知识论危机。科学领域的知识论危机主要表现在,科学理念被还原成了单纯的实证性事实科学,造成了福柯所言的“人类学沉睡”<sup>[8]15</sup>。这种对科学及其知识论本质、过程与归宿的全方位反思同样波及了社会科学中的跨文化传播学研究领域。跨文化传播学学术共同体内部开始反思实证主义与相对主义进路建构的跨文化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将关于文化的知识生产割裂于人的存在、社会与历史的存在,使其局限于一种“本质主义”“计算主义”“中立主义”的知识话语体系中,更与朝向促进人类跨文化交往的总体性知识目标存在差距。

#### 1. 本体危机

在跨文化传播学的学理化建制中,关于文化的概念与理论建设是重要部分,实证主义将文化经验实体化为可直观经验的行为与心理事实,相对主义者将文化经验相对化为系统内联合作用下的稳定关系结构,其对文化的稳定性、同质性界定使得跨文化传播学陷入对文化定义的固态思维。跨文化传播学的现代知识论本体视域叠加人类学、心理学研究方法影响,形成了其知识生产以追求关于文化的“形而上学”为宗旨的学术气质。在此过程中,文化在学术话语中常以“类型”“模式”“模型”等表述出现,被看作是一种非人的、物化的衍生物。而“文化”(culture)本意是农作物的培育与生长,18世纪以后引申为“对人的培养”之意。跨文化传播学对文化的客观化与本质化界定将文化置于一种与人的割裂状态中,失去了对人的道德性、生命性和情感性的知识观照。此外,由于人与文化的同根共生关系,文化本身是“流动的”(liquid),文化的边界也处于持续性变化中。跨文化传播学对文化的固态化、实体化界定使得其知识的解释力严重不足。正如福柯所言:“现代哲学把对人的有限性所作的经验分析误当成了对人的无限本质所作的先验分析。”<sup>[8]15</sup>因而,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在对“文化”与“文化的载体——人”的实体化、固态化界定上使其陷入某种程度的本质主义危机。

#### 2. 方法危机

跨文化传播学学理化建设是在学术共同体共同遵守的研究范式与规范下推进完成的,实证主义与相对主义以“经验与经验”“经验与先验”之间的因果性、相关性确证过程作为知识生产的唯一路径,其对纯粹理性的知识追求使得跨文化传播学陷入对经

验的量、质、关系、模态的纯粹评估中。跨文化传播学方法论普遍受社会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的客观经验范式影响,通过量性统计、质性归纳来分析文化之于人类传播活动的整体作用机制。在此过程中,文化作为一个同质性的变量被纳入知识生产流程,以探索文化作为自变量如何引发心理、行为、态度等变量的变化,探索文化作为因变量如何在语言、非语言、心理等自变量的变化下产生变化。对于文化变量的观察仅以其外显的行为、心理、语言作为路径,而忽视了文化变量内在的复杂性。此外,人作为社会与历史的产物,关于人的文化知识亦属于社会与历史的知识,不同于“自然—世界”的经验恒定性与同一性,由人构成的“社会/历史—世界”经验是非恒定的且非必然的,用科学的客观确证思路还原人类“社会/历史—世界”,使得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的社会适用性与调节性严重不足。正如彼得·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所言:“作为世界创造者的人被理解为世界的产品,人类活动则被理解为非人过程的附带现象。”<sup>[9]</sup>因而,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在对文化及其相关变量的因果性与相关性确证中走向了某种计算主义危机。

### 3. 价值危机

跨文化传播学学理化进程是在启蒙时代以来的人类交往理性与现代知识论真理观的价值引导下共同建构而成的,然而,启蒙时代的人类跨文化交往经验并不是均衡发育的。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在某种程度上是假“普遍性”之名的“地方性”知识,同时,其所秉承的客观真理式知识观也脱离了人类跨文化交往的实践需求,因而使得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陷于一种西方独语式与唯理式知识危机之中。首先,跨文化传播学的知识发轫与学理化进程是在欧美跨文化经验与社科知识体系中形成的,其知识生产服从、服务于西方文明扩张与文化传播的战略需求,其知识价值取向是在欧美国际政治经济框架下涵化而成的,这与促进人类普遍交往的应然知识使命与格局相差甚远。其次,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在“求真”的知识观念下运用各种切片式的物化思维将文化进行支离性分解,其追求文化“形而上学”的知识宗旨使得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始终停留在“纯粹理性”层面,而没有内化成跨文化交际者在实践中的能力与技能,因而也就无从赋能于人类文明互鉴与文化往来。因此,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的非均衡式与非实用式价值取向,使其陷入西方中心主义与唯理主义危机。

## 四、知识的德性化

20世纪中叶以来,知识界对社会科学领域的纯粹客观经验主义危机进行持续反思,如何在实证主义学理化进程的旁边建构某种非客观主义路径。随着西方哲学整体驶向语言学与“人本主义”思潮,在现代知识的普遍性、客观性、必然性、确定性追求的旁边,出现“崇尚非理性、反本质、反基础、强调差异性、相对性、破碎性、局部性”<sup>[6]</sup><sup>209</sup>的后现代知识。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受相对主义与建构主义影响进一步加深,非理性知识的合法性确证得以被提出、被探讨。比如,以埃米里·杜克海姆和卡尔·曼海姆为代表的早期知识社会学,把知识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和认识结果来研究,探索知识与社会存在之间的互构性关系。在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领域,默顿学派与爱丁堡学派等也考察了科学知识的“社会性”与“人格性”建构过程。随着知识论研究的“非理性”化探索程度进一步加深,加之20世纪60年代知识界开始反思“二战”后的人类生存境遇与共处逻辑,社会科学知识关怀开始关注人的精神结构与生命价值。在此过程中,个体生命性的非客观经验(如本能、直觉、道德等)被纳入知识生产的经验来源,知识界称其为“知识论的德性转向”(the virtue turn)<sup>[10]</sup>。“德性知识论的出现,为许多传统以来的知识论难题(包括价值问题、葛梯尔难题、特别是怀疑论)铺陈出一个崭新的进路,并且也展现了很好的问题解决能力”<sup>[11]</sup>,德性知识论成为思考知识价值的新方案,现代知识论中的“经验”问题、“经验与知识的确证”问题在当代德性知识论框架下重新被界定,德性知识论走向也为国际范围内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带来新思路。

### 1. 当代知识论的德性转向

德性(virtue)<sup>⑤</sup>在知识史中并不陌生。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提出过“美德即知识”的价值论知识观。在启蒙时代,康德知识论中也将道德哲学纳入其哲学的实践部分。20世纪西方知识论重提“德性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是试图“重返”亚里士多德那里,借用其理智德性概念讨论知识之为知识所需要的理智德性。不同于现代知识论将知识视为“确证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ve),德性知识论认为“知识是产生于认知德性的真信念”<sup>[12]</sup>,知识生产是认知主体内部理智德性作用的结果。这使

得德性知识论不再关注“确证的真信念”的具体条件,而是关注认知主体的内在状态,关注其生成知识所需要的理智德性。基于此形成了 20 世纪下半叶德性知识论的基本本体、方法、价值视域,即在知识本体上,开始从“主体”对“客体”的经验事实确证思维转向人的内在精神结构;在知识获取的方法论上,从把经验、理性、逻辑作为知识基础转向把人的生命体验、非理性经验、道德价值等作为知识来源;在知识的价值论层面,也从以往追求普遍真理转向对知识的实用性价值以及对个体生命、本能、个性、品格的颂扬。

## 2. 德性知识论视域下跨文化传播学的新知识生产

美国哲学家欧内斯特·索萨于 1980 年提出了建立在卓越能力基础之上的德性知识论。在德性知识论视域下,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不再执着于通过对文化进行本质化拆解来拓展对“文化他者”的理解,而是转向跨文化传播知识的人本性内在能动与理智德性建构,从而形成了 20 世纪下半叶美国跨文化能力、跨文化敏感等理论生态。

索萨德性知识论把知识视为行动或表现(knowledge as an action),因此,知态的规范性就会成为表现规范性这个模型下的某种特例。比如,射击运动员的“表现规范性”在于他的射击精准度(Accuracy)和技巧纯熟度(Adroitness),以及能够根据不同场地风速调整瞄准偏向的适切度(Aptness)。在索萨“以表现为基础规范性”的“三 A 架构”下,知识作为一种“表现”的要求要远远高于单纯的“真信念”。因而,索萨将知识的本质与价值分为三类,即通过感官、记忆、直觉获得的第一阶层知识——“动物之知”;通过反省能力掌握第一序适切信念而获得的第二阶层知识——“反省之知”;同时包含且建基于第一、二序适切信念的第三阶层知识——“完好之知”。因而,知识在三个阶序的“适切”调整中以其规范性彰显知识的“品格”。

与索萨德性知识论的知态规范性相匹配的,是跨文化传播学知识领域开始关注人在跨文化语境下的能动性,人的能力作为一种非客观经验被纳入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的经验来源,并形成了如跨文化能力、跨文化敏感、文化胜任力等理论,同时通过跨文化培训的方式将理论知识转化为人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行为“表现”。跨文化交际中的知识主体也在“良好”沟通的价值导向下,通过三阶“适切的信念”的调整,生产出具有某种“品格”的能力知识。

例如,跨文化能力理论普遍认为跨文化能力包含三种概念范畴,分别是“强调跨文化语境下行为性的理解与合作”的跨文化理解力(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强调跨文化语境下心理性的接受与平衡”的跨文化适应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和“强调跨文化语境下生命性制造与创新”的跨文化直觉力(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sup>[13]</sup>。跨文化能力不是表现为个体单纯对于文化及文化知识的“知道”,而是个体根据不同的语境修正使用语言行为的能力。“一个有能力的传播者应该是以‘合适的’和‘合作的’方式,对传播环境进行控制和把握的人”,“据说人与人发生互动时,有一半思想与他们想达到的目标和运用的策略有关”<sup>[14]</sup>。也就是说,跨文化能力的知识不是一种“认知”,而是一种“行动表现”和“心灵状态”。基于此,为培养人的跨文化能力而衍生的跨文化培训理论认为,“知识来自人的‘自反思考’,教育不是‘传授’”<sup>[15]</sup>,而是为知识主体营造一种跨文化经验的试验场,知识主体通过反思自身在跨文化体验中的感官冲突(“动物之知”)形成“自省之知”,继而调整跨文化言行与心灵状态形成跨文化交流的规范性表现(“完好之知”)。

由此可见,索萨德性知识论视域下美国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开始尝试走出现代知识论的异化状态,将“人的能力与品格”这一理智德性纳入知识的确证思维中,形成了跨文化传播学新知识生产的本体、方法与价值视域。首先,在知识本体层面,索萨德性知识论视域下跨文化传播学本体视域开始逐渐走出对于文化的实体性、固态性本质主义思维,而将人内在的意识性、流动性非客观经验纳入其知识生产的经验来源。对于文化的知识生产由此从“与人割裂”的非人状态开始向人的境遇、人的本质回归,文化不再通过人的行为、心理外显,而是内在于人、人的活动,并时时处在不断生成与变化的意识流动中。其次,在知识生产方法层面,索萨德性知识论视域下跨文化传播学研究方法开始逐渐走出纯粹理性的计算主义确证思路,而将感官之知、反思之知和规范之知的非客观主义经验纳入其知识生产方法中。对于文化的知识生产不再执着于对文化变量的关系计算,而是通过生命性诠释来建构主观经验。最后,在知识价值方面,索萨德性知识论视域下跨文化传播知识生产不再追求普遍且恒定的“真理观”,而是接受知识的实用价值与多元价值。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的目的不仅在于对人的行为和心灵的预测,

还在于其对于个体、社会的实用性与功效性。

西方哲学德性知识论为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走出现代知识论局限性提供了新视域,形成了跨文化传播学学理化的又一进路,同时也为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走出地方性危机提供了新的讨论空间。

## 五、知识的开放化

20世纪下半叶,全球传播生态重组,“跨文化”问题不再是欧美“殖民化”“现代化”的问题,越来越多的新独立民族国家开始关注跨文化传播学知识体系建设问题,跨文化传播学由此走向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化视野。“德性”知识在欧美跨文化传播学领域的“返古开今”,是其走出知识现代性危机的探索,同时也将跨文化传播学推向一种非本质主义、建构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开放性视野,为国际跨文化传播学新知识生产提供了新的对话空间。借由此,中国知识论对德性知识的差异化界定与建构路径即可拓展当前跨文化传播学德性知识生产的本体、方法与价值思路,为建构世界性跨文化传播学多元理论生态提供智慧。

### 1. 本体拓展

从科学主义知识论到德性知识论,欧美跨文化传播学学理化进路已然从实证主义、相对主义向建构主义演进,其关于知识的本体界定也从本质主义驶入非本质主义,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将理智能力这一非客观经验纳入知识经验来源,使其对于文化的知识生产由此走向非固态化、流动化的本体视域。在此基础上,中国知识论的德性观对“德性”的界定不仅仅局限于“理智能力”“品格特性”,还包括“伦理道德”,这为拓展跨文化传播学本体视域提供了新思路。

从本体论视角来看,中国哲学所秉持的本体论观念是“天人合一”的整体性实在论思想,其认为知识不源于关于客观世界的抽象认知,而源于同主观相联系的人、事件、历史或世界。在中国知识论视域下,知识本身就是与实在界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具有连续性的整体过程,知识的获取与主观信念、感知相联系,是一种与人的内在生命力紧密相关的有机知识。朝向整体论知识观,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对于文化主体的界定将不再局限于“人”(群、族、国)的主体性或“人”(群、族、国)与“人”(群、族、国)的主体间性之中考察,而是升维至人与自然的整体性本体范畴。《易经》云:“观乎天文,以察时

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sup>[16]117</sup>意思是说,观察天的“纹理”(运行规律)就能掌握时节的变化规律(天道),以天道的运行规律用于人道,使人类社会遵守“文礼”“文德”(人道),从而受到化育。中国哲学中“文化”自身形成一个天人之间“道”与“德”动态转化的运行系统,人在其中善于观察自然,顺应自然,以自然之道内化于人道,通过遵守天道与人道而形成人的“德”。由此可知,中国文化观与“天人”“道德”的本体思想具有高度内在统一性,“文化”生于道与德的转化过程中,其以人之“德”的内化与道德主体的生成作为知识归宿。

因此,基于中西“德性”知识的差异性认知,中国知识论对文化的本体界定为当下欧美主导的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走出现代性危机提供了新视角,即跨文化传播学新知识生产对于“文化”的本体界定不仅仅是行为—心理的抽象类型与理性能力建构下的文化意识流动,而是可以升维至中国德性知识观念,以重建“文化”的本体认知。中国德性知识论下的跨文化传播学知识本体包含天道与人德的互动机理,同时将生命性与非生命性的混杂序列综合纳入其中。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以跨文化心流、跨文化直觉和跨文化正念等知识范畴为索引,尝试建构整体化、全人化与伦理化的跨文化传播学知识本体视域。

### 2. 方法创新

在跨文化传播学学理化进程中,基于知识生产方法的共识是学科化与专业化的重要规范,从现代知识论涵化下的客观经验主义实证方法到德性知识论的非客观主义建构式方法,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逐步走向一种诠释性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中国知识论中对德性知识的建构方式或可为跨文化传播学新知识生产提供新视角。

从方法论视角来看,中国知识论不同于西方知识论的“确证”思维,其关于“天与人”“道与德”的整体性实在论思想奠定了德性知识生产不仅仅停留在知识主体的观察中,而是要通过生命的、非生命的多种渠道来建立知性觉知系统。《周易》观卦中所言的“观”<sup>[16]107</sup>是中国知识论中关于知识获取的重要路径,此“观”不同于西方知识论中的“观察”,而是一种“综合观察”,即用联系的、整体的方式来认识自然与人的联动。《周易》咸卦<sup>[16]164</sup>中也认为,知识源于两种生命力(气)相互感应,即人通过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形成“感”与“应”。类似的表述在荀子的《解蔽》中也有所提及,荀子认为的“知识”

需通过心智的“虚无、统一、静止”而获得觉知的“大清明”<sup>[17]</sup>。心智的“明”不同于西方德性知识论的“确证”，而是通过“综合观察”“感与应”“虚无、统一、静止”寻得的心智觉悟。

因此，基于中外知识论的方法差异，跨文化传播学德性知识获得的来源与方法可以拓展到心智空间，将知识主体的人心、人性、人体与自然（天）的综合性、交互性的感应觉知路径纳入知识生产的方法论版图。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不仅可以以人体行为与心理显化出来的自然事实作为其确证的经验证据，而且可以通过建构主体能动性来获取关于文化的流动性经验与意识框架，还可以将外在感官之“感”与内在心智之“应”结合起来“综合观察”文化在“天人”“道德”之间的意念流动、循环与新生，从而达成某种情感共鸣、意念联结与德性的共在。

### 3. 价值升维

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从追求现代知识论的“求真”到德性知识论的“求用”，其关于知识价值的界定与探寻已然走向了多元价值探索中，“德性”作为兼具人本性与伦理性的价值维度，为跨文化传播学从地方性知识走向世界性知识提供了价值对话空间。中国知识论的“天人合一”本体观与“综合观察”方法论为当前人类文明互鉴提供了新的共处价值观与交往智慧。

从价值论视角来看，不同于西方知识论的“真理观”与“实用观”，中国德性知识论因包含“天人”之间、“道德”之间的内外循环与综合转化，其知识生产呈现出更为丰富的价值取向。首先，虽然西方德性知识论对于真理观的追求已然从普遍真理向多元真理转变，但依旧追求以理智为基底的实用知识，而中国哲学认为的德性知识是一种伦理性的、非理性的非本质主义知识。其次，西方德性知识论的“德性”不包含情感与潜能<sup>⑥</sup>，而中国的德性知识观是从仁道出发，注重自然亲情，更突出身心合一、情意一体的德性观念。最后，西方德性知识论“求真”“求用”的价值导向在一定程度上是服务于提升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的，而中国知识论则朝向对天人合一与和谐共处的至善价值。

因此，中国德性知识观下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的价值旨归也随之廓清，即从追求知识的理智德性向伦理德性滑移，从探索知识的外在客观性到内在协同性拓展，从求索知识的实用性价值向正念性价值升维。中国德性知识观下的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生产将文化主体的跨文化能力探索升维至人格伦理

层面，将人类跨文化交往的正义规范与人格道德等伦理德性知识作为价值旨归。通过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的新知识生产，人类跨文化交往观念将超越既往零和博弈的战略思维向探索人类“共同善”价值挪移。

## 结 语

总而言之，综观跨文化传播学知识“显化”“驯化”的学理化过程，其知识生产在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方面总体呈现出现代知识的客观性、确证性与普遍性特征。基于现代跨文化交往经验的跨文化知识体系将“文化他者”的“陌生经验”作为先验抽象与直观的对象，以生产关于文化的“客观性”“普遍性”知识作为价值标准。进入 21 世纪，人类跨文化交往经验在信息传播技术革命与地缘政治结构调整中走向重构。朝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现代知识论视域下的跨文化传播学在知识本体、知识生产方法与价值导向方面均呈现出一定的知识局限性，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善”的知识格局存有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知识界在对现代知识体系进行反思的同时，受 20 世纪以来哲学领域的非理性与人本性转向影响，知识论研究出现社会性、人格性、生命性的建构主义特征。跨文化传播学也借由建构主义路径出现人本性的德性知识论转向。德性知识论为建设朝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跨文化传播知识体系提供了新的思想起点与开放性的对话空间。而中国知识观中包含着不同于西方知识论的德性智慧。在本体论层面，中国德性知识观下“伦理道德”的非本质主义文化经验被纳入跨文化传播学新知识本体视域。在方法论层面，中国德性知识观下的“感与应”“格物致知”“解蔽”等方法创新也可成为一种跨文化传播学新知识生产范式。同时，中国德性知识观下的跨文化传播学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知性智慧融入“人（群、族、国）”“人（群、族、国）与人（群、族、国）”的关系重建与跨文化智慧的普遍提升。基于此，中西“德性知识”对话为跨文化传播学走出现代知识论危机提供了可能理路，同时也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均衡化跨文化传播知识生态提供知识平台和商榷空间，为中国跨文化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了可能。

### 注释

①古希腊传统知识论是以追求“知识与真理相符合”的实在论。笛

卡尔确立的知识论是在现代科学体系下以实验的方法为外部世界、内在自我以及超验知识寻找事实基础,并确立证成关系的知识分析方法。20世纪的知识论较为复杂与多元,总体来讲受量子力学原理影响,知识来源不再单纯依托内在基础事实的证成规范,普遍性知识价值被重构,因而非基础的、非内在的经验来源成为知识联结与生发的重要机制,如语言论、语境论等。②“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是1982年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中制定的传播学研究“十六字方针”。③此处的“异化”取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之意,用以说明主体与客体的分裂。④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主要包括符号概括(如定律、公式)、范式的形而上学部分(如模型、信念等)、价值和范例。⑤德性(virtue)一词在英文语境中的使用来源于古希腊语“arete”一词,其基本含义是万物的卓越功能。在古希腊时期,“arete”从强调万物的卓越功能(在自然属性方面)转向强调人的卓越功能(在社会属性方面)。苏格拉底提出“德性即知识”,此处德性是指人本质性的卓越功能。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作为灵魂构成部分的不同功能,有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之分。陈嘉明认为,“德性”(virtue)是一种使人成为善的以及能够运行它的真正功能的状态。⑥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人的心灵中有三种状态:情感、潜能和品质。德性不是情感,因为德性有高贵卑劣,而情感不可作此价值判断,也就不能遭到赞扬和谴责;情感是自发的,但德性却是选择的结果;情感是被感动的,德性却是以某种方式被赋予的。德性也不是潜能,因为潜能是天生的,无法说它是善良的或恶劣的,但那些被称为善良或恶劣的东西可以是德性。这样一来,只剩下一种可能性,即德性是品质。

#### 参考文献

[1] 成中英. 中国哲学中的知识论(上)[J]. 曹绮萍,译.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1):5-16.  
[2] 高秉江. 西方知识论的超越之路:从毕达哥拉斯到胡塞尔[M]. 北

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姜飞. 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三十年探讨(1978-2008)[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5):16-21.  
[4] 何志青. 知识论的转折[M]. 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8:前言 i.  
[5] 邓晓芒. 康德哲学讲演录[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7.  
[6] 顾林正. 从个体知识到社会知识:罗蒂的知识论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7] 华勒斯坦,等. 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M]. 刘锋,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8-9.  
[8] 福柯. 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M]. 莫伟民,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  
[9] 伯格,卢克曼. 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M]. 吴肃然,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112.  
[10] 米建国,叶方兴. 当代知识论的德性转型:台湾东吴大学哲学系米建国教授学术访谈[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21-28.  
[11] 米建国. 两种德性知识论:知识的本质、价值与怀疑论[J]. 世界哲学,2014(5):21-32.  
[12] 陈嘉明. 德性知识论[J]. 东南学术,2003(1):116-123.  
[13] 张楠,姜飞. 能力的“绵延”:朝向生命哲学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研究[J]. 南京社会科学,2019(9):103-111.  
[14] 王怡红. 西方“传播能力”研究初探[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1):57-66.  
[15] 张楠,姜飞.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跨文化能力的知识互镜与返本创新[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6):35-46.  
[16] 周易[M]. 郭彧,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6.  
[17] 荀子[M]. 安小兰,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7:223.

##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s and the Virtue Turn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Zhang Nan Jiang Fei

**Abstrac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y, as a field of knowledge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that focu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has been entrusted with the intellectual mission and expectation of reflecting on the common values of all human beings and reconstructing the rationalit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However, the current knowledge system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based on the modern experienc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modern epistemology, which shows the pursuit of essentialism, computationalism, and universalism of culture in ontology, methodology and value theory, and its academic vision and knowledge care are somewhat distant from the knowledge goal of exploring the common value of all manki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entering a period of value and order restructuring, the humanistic trend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 has promoted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and personal constructivist features in the study of knowledg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have also taken the constructivist path to turn to the human nature of virtue epistemology. Virtue epistemology provides a new starting poi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form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knowledge system. The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views of virtue knowledge provides a possible way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o get out of the crisis of modern epistemology, and also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discussion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balanced theoretical ecology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s; epistemology; virtue; virtue epistemology

责任编辑:沐紫